
“差序化代入”： 乡村生计方式的一种变迁机制及其意义 ——基于攀枝花 X 村两次产业转型的调查¹

刘夏蓓 黄章宏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国家政策等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变动, 乡村生计方式发生多次改变。本文所关注的 X 村先“非农化”发展再“回归”农业生产的改变, 是近年来一类资源型村庄生计方式变迁的代表。研究表明, X 村两次转型的过程都是“先行者”带领村民逐步转变生计方式的过程。“先行者”按照以己为中心, 以血缘亲疏、地缘远近“差序化”代入的方式, 带领其他村民进入到新的生计方式之中的“行动逻辑”, 在农村项目引进、工作引荐以及产品运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带领作用, 促成了村庄生计方式的转变。本文认为, 在解决转变生计方式的难题时, X 村村民是基于村庄的自然资源和产业发展经验, 将“差序化”的社会关系“代入”其中而成功的。“差序化代入”是资源型村庄的一种生计方式“变迁机制”。该案例说明, 尽管外部结构性因素不断变动, 村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仍具有强大的惯性, 乡土社会关系对维持乡村秩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可为解决供给侧改革中的员工·分流安置问题提供启示。

【关键词】 农村生计变迁机制; 差序化代入; 资源型村庄; 四川攀枝花

【中图分类号】 F3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7)05-0070-08

随着市场经济、国家政策等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变动, 乡村生计方式发生多次改变。改革开放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 随着资本下乡, 很多资源型村庄通过资源开发办起了工业, 走向“非农化”, 钢铁、煤炭等成为村庄的主导产业和村民的主要生计来源。但如今, 面对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外部市场产能过剩以及环境保护的压力, 加之个别地区资源的逐步枯竭, 很多资源型村庄亟待转型。

生计方式变迁是社会文化变迁的源头与基础, 村庄转型的核心是村民生计方式的转变。该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带来个体从

¹收稿日期: 2017-02-01

基金项目: 国家文物局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变迁重访调查”(SKHX2015306)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夏蓓(1963—),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法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学与社会学; 黄章宏(1996—), 男, 四川攀枝花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2014 级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

业人员生计方式的丧失、造成大规模的失业现象，甚至会导致村庄乃至社会的秩序混乱。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媒体以及学界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城市转型以及员工安置问题，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源型村庄的转型。例如，国务院发布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媒体也解读了国家政策，报道了转型困境^[1]；学界大量研究了宏观的经济政策意义以及可能出现的失业问题^[2-4]。遗憾的是，上述视野中很少涉猎资源型村庄及其刚刚进入第二产业经营或从业的乡村村民，但这却是关乎千万农民的生计问题。

于此，笔者选择攀枝花 X 村为个案，关注资源型村庄的转型问题。在返乡调研中，我们了解到：从 2013 年底开始，攀枝花市就关停了 100 多家小矿山、小钢厂，压缩钢铁产能 400 万吨^①，一些资源型村庄正积极转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X 村先“非农化”发展，后又回归农业生产，在 10 年间已实现两次产业转型，村民自主地转变了生计方式。那么，村民的“行动逻辑”是什么，整个村庄生计方式的“变迁机制”又是什么？这引起了我们团队极大的兴趣，成为本文研究的问题和调研的动因。

一、文献综述

“生计方式”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指人类群体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所采取的整套的谋生手段^{[5]163}。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结构这两个视角研究了个人求职过程和少数民族生计变迁。

“社会资本视角”即关注个人社会关系的强弱、社会资本的丰欠对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林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6]28}。在“社会资本与求职过程”的经验研究中，格兰诺维特等关注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指出弱关系者之间的异质性更高，信息量越大、质越高，所以使用弱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入职收入较高^[7]。边燕杰在中国的调查中发现人们更多地运用强关系获得工作^[8]。钱芳、陈东有则将其引入农民工研究并得出结论：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的满意度更高，通过弱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在收入、就业正规程度等客观就业质量方面更高^[9]。此外，赵延东、风笑天等综合分析了社会资本对职工“再就业”的影响，他们在 1998 和 2000 年的量化研究证明了社会资本对职工能否获得再就业机会有着显著的影响^[10-11]；陈瑛等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研究中指出，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其本土化程度会抑制其作用的发挥^[12]。

“社会结构视角”即关注国家政策调整、市场供需变动以及生态环境变化等结构性因素对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这主要见于相关学者对少数民族生计方式变迁的研究。如刘正江研究了新疆牧民定居政策带来哈萨克族定居牧民由传统游牧到农耕等的生计方式变迁^[13]。周建新、于玉慧从环境特点、国家政策、市场需求等方面分析了哈尼族从刀耕火种到橡胶产业发展的生计转型动因^[14]。温士贤认为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的合力推动使怒族社会的生计方式由家计经济向市场化方向转型^[15]。

综上，社会资本视角强调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社会结构视角侧重于强调宏观的结构性因素，这两个视角对生计方式变迁已进行较为系统的讨论，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需要指出的是，乡村生计方式变迁既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也离不开个人的能动性过程。因此，在上述两个视角的基础上，本文将“乡村生计方式变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以攀枝花 X 村为代表的一类资源型村庄的生计方式变迁机制。采用整体论、过程视角，先呈现 X 村生计方式变迁的概况，再分析从“先行者的行动逻辑”到“村庄生计方式变迁”的过程，从而更多地关注村庄内部乡土社会关系的特征，并强调其对整个村庄生计方式变迁的作用，提出“差异化代入”的概念以进行过程性的变迁机制解释。

二、资料与方法

本文的讨论建立在对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益民乡 X 村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按照学术惯例，所涉及的人名、企业名和村庄名均已进行匿名化处理。

（一）田野地点概况

攀枝花位于我国川、滇交界地带，因矿而建，因钢而兴，是我国著名的资源型城市。调研地“X村”属攀枝花市盐边县益民乡管辖，既是一个由血缘及地缘纽带所连接的传统自然村，又是一个位于矿区且光热、土地资源丰富的典型的资源型村庄。

X村共有102户405人。在血缘格局上，X村并非单姓村，是由多个家族共同组成，李家、张家、赖家等是村中的大家族，也有韦、颜、赵、黄等小姓氏。村庄中人口流动较少，除黄氏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外地迁入外，其余家族据称都已在此生活了几百年，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常年都不超过5个。村庄内部的通婚使90%左右的村民都互相有了血缘关系，可以说，X村的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相互交织。血缘关系也影响了政治格局，选举的生产队长都是来自李家、张家、赖家等大家族。近年来是李小四和李老大各任了两届（三年一届），他们是堂兄弟。文化方面，村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现在有4名本科生、7名专科生，40岁左右的村民多是小学或者初中文化，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仍有不少人不识字。X村位于钒钛磁铁矿资源极为丰富的攀枝花市，这成为X村钒钛磁铁矿洗选产业（下文简称“洗选产业”）兴起的重要原因；X村年均气温20.3℃、年日照时数达2700小时、无霜期达300天以上，其优越的光热条件为其特色农业发展创造了可能；而由0.62亩的承包耕地和自垦山地组成的人均约4亩的土地资源更为其工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可以说，X村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村庄。随着市场的资本进入、供求变化以及国家产业、环保政策的调整，X村依托其自然资源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了从传统农业转向洗选产业、再转到特色农业的两次产业转型，显得尤为特殊、引人注目。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和文献法。2016年7月，笔者用两周的时间先后走访了“新峰矿业有限公司”等10余家停产工厂，观察工厂衰败现状；访谈了出租土地的村民、矿业投资者和村干部，向他们了解X村的矿业发展历程。2017年1月，笔者又用了三周的时间到村民家中、农产品收购点以及田间地头观察X村的番茄等早春反季节蔬菜生产情况，与他们一起交流近年来村庄的生产生活变化；同时，与李小四队长^①（下文称“李队长”）、李小勇等多位村民就村庄生计方式变迁进行深度访谈。笔者主要参阅了差序格局、供给侧改革以及生计方式变迁相关的文献，先后访了15位村民、2位村干部、2位矿业投资者、1位农产品收购商以及1位乡政府工作人员等共计21人。

三、生计方式变迁的概况

近十年，在两次产业转型中，X村生计方式的变迁历程是：先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转为土地租赁、矿产运输及工厂务工等多种生计方式，之后又转回特色农产品生产、包装与搬运。

（一）第一次产业转型：“非农化”转变

2006年，在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当地政府积极推动招商引资的背景下，X村发生了第一次产业转型，主导产业由传统农业转向洗选产业。此前，村民以传统农业为生，他们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少量种植蔬菜和水果，日子过得相对宽松。2006年以后，李队长引进投资者到村投资，建设了新峰等13家中小企业，企业资产从几十万元到上亿元不等，洗选产业发展起来。得益于洗选产业的快速发展，村民进行土地租赁、矿产运输和工厂务工，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转为工业收益，在较短的时间内增收致富。

土地租赁是农户将富余山地租赁给投资人建厂，每年每亩收取3000-4000元的租金，先后共有18户村民的土地被租赁建厂。此外，村中有23户村民先后购车从事矿物运输，在鼎盛时期，每辆车的月均运费收入约1.5万元；还有30多位村民进厂务工，月薪可达到3000元。如此一来，全村80%^②的家庭都参与到洗选产业中。

（二）第二次产业转型：“回归”农业生产

X村的第二次产业转型从2013年底开始，主导产业由洗选产业转为特色农业。由于市场产能过剩，再加上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的压力，X村所有的洗选企业在2013年底全部倒闭。企业倒闭后，土地出租者不再有“旱涝保收”的土地租金、工厂务工人员直接失业、个体运输户丧失货源，产业的衰败严重影响了村庄的社会生活秩序。

可喜的是，攀枝花除了矿产资源，还有丰富的土地、光热资源，非常适宜早春蔬菜和特色水果生产；也正是在2013年，攀枝花番茄销路拓展、价格攀升，达到了每斤3元左右。早春反季节蔬菜种植的显著收益让村民看到了希望，X村人均4亩的土地资源也可容纳大部分的村民返家从事农业生产，于是他们纷纷“回归”农业生产。

由于经历了洗选产业这一典型的工业发展时期，村民对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产业链条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他们更关注市场的需求信息，不断调节种植品种、时令与规模；另一方面，他们更注重市场化的供给要求，从自身的土地、光热资源优势出发，重视农产品的标准化与规模化生产。自2013年以来，X村番茄、四季豆等早春反季节蔬菜以及芒果等特色水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90%的家庭参与生产、18位村民投入装运，农产品已销往北京、上海等城市，特色农业为户均创收4万元^④。

四、生计方式变迁的过程分析

X村两次转型的过程都是“先行者”带领村民逐步转变生计方式的过程。“先行者”按照以己为中心，以血缘亲疏、地缘远近“差序化”的代入方式，带领其他村民进入到新的生计方式转变之中的“行动逻辑”，在项目引进、工作引荐以及产品运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促成了村庄生计方式的转变。

（一）先行者

“先行者”是指X村洗选产业和特色农业兴起的带头人，以及率先进入各个产业环节的村民。他们善于学习、积极探索，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村民的支持与信任，成为促进村庄完成生计方式变迁的重要力量。两次产业转型中，“先行者”成功地其他村民带来了项目、工作和货源。他们以己为中心，按血缘亲疏、地缘远近逐步带领其他村民进入到新的生计方式之中。

李队长是洗选产业发展的先行者，他引进13个洗选项目到X村，使洗选产业发展起来。随着产业链条的完善，矿产品生产、原料与产品运输等领域又涌现出了一批以“租地农户”、“老运输户”等为代表的先行者，他们凭借土地资源成为先行者。特色农业兴起的先行者是率先种植番茄的赵小六等10余户农户，在他们的示范带引下，其他村民也纷纷种植。农产品包装、搬运等工作岗位随之出现，因土地较少而率先前去务工的村民成为了这些产业环节上的先行者。当年，李队长40出头，干劲十足。据他介绍：“我性格直爽、说话有力度，有什么事都能够摆平。”村民袁某也说：“他胆子大，在这个地方吃得开。”在先行者之中，李队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李队长社会关系网丰富，敢于探索尝试，在村民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从投资者的角度为X村洗选产业寻找适合的场地，积极地协调自己的亲属和村民，并处理纠纷，为X村洗选产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项目引进

新产业进入村庄，被X村村民形象地称之为“项目引进”。“项目引进”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李队长先后介绍13位场地租赁者租赁了17户村民的场地，13个洗选企业先后在村中建立，打下了X村“洗选产业”的发展基础；二是10余户村民学习邻村经验，率先种植番茄，而后向亲戚推广，逐步扩大了种植规模，5户农户成为先行者。

在洗选产业发展中，X村共建设了“新峰”等13家中小企业，是李队长先后三轮引进的。2006年，李队长第一轮先引进了第一个水选项目“新峰”，投资人钦某主要租用了李队长的堂兄（李老大和李小勇）的土地。同年，李队长也将自己和妹妹家的山地一同平整、硬化，引进投资人建设了第一个干选企业“翔朝”；还引进了张某的“博凡”，主要租用李队长堂兄（李小勇）

的土地。第一轮引进的三家企业起步早、规模大，在短期内就取得了很好的收益，所以在当时攀枝花兴办矿场的热潮中，钦某、张某等投资人都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宣传 X 村：“X 村 X 队条件不错，可以到那里去找李小四，他可以把事情办好。”又陆续有一些投资人前来考察投资。2009 年，李队长又进行了第二轮引进，他先是引进了投资人曾某到其堂妹（李小秀）地中投资建厂，后又引进投资人李某在李队长自己整合的土地中办厂，引荐周某等到其表兄们的地中建厂。第三轮引进主要在 2010 年以后，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租赁了张老大等农户的土地，他们是李队长的远亲或者无血缘关系的邻居。

梳理李队长与其他土地租赁的农户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我们发现，第一轮是李队长将大项目引进到了自己、妹妹及堂兄的土地中，这是父系近亲的范畴；第二轮又将 3 个项目引进到堂妹夫、表兄地中，血缘关系稍远；第三轮则扩展到了远亲和邻居。总的来看，项目引进呈现出以李队长为中心、以血缘亲疏为纽带的差序化扩展。李队长能成功引进项目在村中落地的原因，是 X 村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李队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他与村民间的血缘、地缘关系

在第二次产业转型中，率先种植番茄等特色农产品的赵小六等 10 余户农户，成为特色农业兴起的先行者。他们在 2013 年学习邻村经验，率先种植番茄，并因当年番茄价格攀升而获益。此后，由于他们的尝试发挥出示范效应，以及迫于产业转型的压力，之前从事矿业的村民纷纷返乡种植番茄。由于农业不确定性因素较大，最先下定决心种植的还是先行者的近亲，因为他们能从亲戚那里得到去年最准确的市场信息和种植经验，所以在次年就开始了种植。此后几年，市场行情都较好，种植番茄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番茄，四季豆、芒果等的种植规模也有所扩大，全村 90% 的农户都参与到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中。社会信任程度的不同以及社会交往频率的差异，村民投入番茄种植分有先后，根本上仍是血缘、地缘纽带的强弱在起作用。

综上，无论是在哪一个产业发展时期，“项目引进”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都是先行者。项目能成功地引向哪位村民？这需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以及先行者与村民的社会关系、社会信任情况。“项目引进”的对象始终呈现出以生产队长为中心、以血缘亲疏往外扩展的特点。

（三）工作引荐

产业发展带来了工作岗位。第一次产业转型时，有打工意愿的土地租户率先进入工厂务工，而后其余村民被引荐进入；第二次转型时，家中土地较少的村民先开始进行农产品的装运，而后其亲属加入。两次转型中的“先行者”为其他村民提供了“工作引荐”的便利。

在发展洗选产业时，企业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聘本村村民，尤其是租地农户。李队长介绍道：“我们队有 20 多人在厂上班，因为工厂招工先满足我们队的人，一般是想打工的租地农户进去之后给老板介绍其他有意愿的村民。”此外，租地农户还会引荐他们的近亲到一些更好的岗位工作。如笔者就了解到李小二在其堂兄引荐下进入新峰开装载机并得到近万元工资的案例。

特色农业发展时，王小梅、任小兵、赖小敏等 3 名土地较少的村民成为农产品装运环节的先行者，他们率先在本村的 3 个果蔬收购点做农产品包装或搬运，后来，他们先后引荐了 15 名村民加入其中。第一位先行者是赖家的四儿媳王小梅，她从 2013 年底就开始从事包装工作。在其引荐下，做运输和在工厂打工的赖氏 5 兄弟加入了农产品的装运，组成一个 10 人的“家族式”装运团队。第二位先行者是长期在村中的冻库打工的任小兵，到了收购旺季，他就会叫上妻子去做包装、邻居韩春发一起搬运；第三位先行者赖小敏带着她的兄弟媳妇、近邻赵小梅等一起做包装。这两位先行者引荐的对象是近亲和近邻，他们组成了两个“近亲近邻式”的装运团队。

在“工厂务工圈”中，进场有先后、工作有好坏。而对农产品装运团体而言，血缘、地缘关系的亲疏就更为重要了，因为实行计件工资制，所以在农产品收购量较为固定的情况下，包装的人数则直接影响工资收益。由此，装运群体多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最近的村民组成，并且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一定的封闭性。无论是“工厂务工圈”，还是“农产品装运圈”，二者扩展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以先行者为中心，按血缘亲疏、地缘远近逐步扩展的特点。

（四）产品运输

矿石的运进与矿粉的运出是洗选产业的重要环节，农产品的外运也直接联系着外部市场。矿物运输时，X 村的运输圈以土地租户、老运输户等先行者为中心，逐步往外扩展，货源则以土地租户为中心“差序化”地分配。洗选产业衰败后，运输户的货车均已转让，农产品由收购商外运。

第一次产业转型中，部分村民从农业进入运输行业，X 村矿物运输圈经历了三轮扩展历程。首先，李小勇利用与工厂间的土地租赁关系率先购买了小货车从事矿物运输。与此同时，长期在外做运输的刘一品等老运输户也开始将本村货源作为主要依托，他们成为矿物运输的“先行者”。第二、三轮扩展出现在 2009 年后的矿业鼎盛时期。第二轮是豆老二、赖小六等 4 户村民成为了土地租户，并加入了矿物运输圈。第三轮则分别朝着土地租户和老运输户的表亲、邻居扩展。如刘一品先后引荐其表亲杨东儿等加入，土地租户李小勇等则引荐其表亲罗黑山等加入。三轮购车之后，X 村共有了 23 辆大小货车，他们基本垄断了村中矿物运输权。整个运输圈呈现出以先行者为中心，以血缘亲疏、地缘远近往外扩展的特点。此外，X 村的货源主要来源于新峰公司，新峰公司给予了土地租户李小勇^⑥分配货源的权利，其运输安排也是以他为中心，以血缘亲疏逐步扩展。村民黄老二介绍：“货少的时候肯定是他先拉，有时老板要求一天或者半天拉完，他会叫上他的姐夫“豆老二”，还有多的才是他的老表。”

第二次产业转型中，洗选产业凋敝导致货源丧失，X 村的矿物运输户们纷纷卖掉货车后返家从事特色农业生产或装运，农产品外运由收购商完成，村民并未参与。

五、“差序化代入”：乡村生计方式的一种变迁机制及其意义

综上，从村民个体的角度来看，按照“以己为中心，按血缘亲疏、地缘远近‘差序化’带领其他村民转变生计方式”的行动逻辑，各位先行者在第一次产业转型中逐步带领其他村民进行土地租赁、进厂务工、矿物运输；第二次产业转型也是如此，种植规模的扩大、装运圈的扩展依旧是先行者带引的结果。可以说，先行者是以此逻辑带领整个村庄转变了生计方式。从整个村庄的角度来看，村庄生计方式的变迁依托的是村庄内生性的力量，在解决生计方式转变的难题时，村民像解方程一样，运用了“代入法”，他们是将“差序化”的乡土社会关系“代入”到解决转变生计方式的难题之中，并取得了成功。X 村生计方式的变迁机制就是“差序化代入”。

表 1. 村庄生计方式变迁情况

带引方式 及变迁结果	第一次产业转型		第二次产业转型	
	生计类型	参与情况	生计类型	参与情况
项目引进	土地租赁	先行者：1 人	番茄种植	先行者：10 余户
		共参与：17 户		共参与：90%的家庭
工作引荐	工厂务工	先行者：3 人	产品装运	先行者：3 人
		共参与：30 余位		共参与：18 人
产品运输	矿物运输	先行者：4 户	由收购商完成、村民未参与	

		共参与：23 户	
变迁结果	从 95%的家庭以务农为主到 80%的家庭从事洗选产业相关工作		从 80%的家庭依靠洗选产业到 95%的家庭转为特色农业

首先，“差序化代入”机制表明：先行者的行动逻辑反映出乡土社会关系仍有“差序化”的特点。这一判断，既是出于对 X 村先行者行动逻辑的总结，也是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做出的。“差序格局”由费孝通提出，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论证或修正^[16-19]。阎云翔之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关系上研究差序格局；但他认为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和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20]；孙国东、周飞舟等在之后的研究中支持了他的看法^[21-22]，翟学伟却反驳了他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差序格局放到立起来的架格上看”^[23]，吴飞也认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核心就是同心圆结构，这种结构无法解释阎云翔的等级结构”^[24]。此外，从对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的讨论^[25]，到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出发对差序格局进行重新理解^[26]，再到讨论“随礼失随”反映出的新差序格局^[27]，学界也关注到社会变迁下差序格局的适用性。最近，更有学者“较真”差序格局，认为“差序格局概念并非对历史中国甚或乡土中国社会格局的描述和概括”^[28]。虽然差序格局的确“留下来很多疑问有待澄清”^[29]，但根据 X 村调研结果，我们认为费孝通对于乡土社会关系的经典描述仍然具有极高的解释力。他说：“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了”。^{[30]34} 他是将乡土社会关系描述为一个“同心圆结构”，乡土社会关系的强弱是由血缘的亲疏、地缘的远近决定的，乡土社会关系具有“差序化”的特征，X 村案例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肯定自然资源、市场供求以及国家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之上，“差序化代入”机制核心强调的是：尽管外部结构性因素不断变动，乡土社会“差序化”的社会关系仍然在一类资源型村庄的生计方式变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X 村从“非农化”发展到“回归”农业生产的生计方式转变，实际上代表了近年来一类资源型村庄的生计方式变迁，即先依托矿产资源优势发展工业，之后被迫转型为特色农业或者旅游业等。从 X 村个案来看，他们转变生计方式的经验是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状况、产业发展经验以及市场供需关系，“代入”乡土社会“差序化”的社会关系解决生计方式转变难题。如此一来，在先行者的带引下，村民可以便利地获取工作机会、货源、投资人等市场资源，充分地利用独特的土地、矿产与光热等自然资源，从而进入到新的生计方式之中。这一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差序化代入”的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案例表明，市场、政策环境等外部结构性因素变动对村庄社会结构最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了村民的生计方式，进而使村庄发生了产业结构的转型。然而，从产业转型和生计方式转变的过程来看，尽管外部结构性因素不断变动，村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仍未根本动摇且具有强大的惯性。在维持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秩序、促进社会变迁中乡村治理上，传统的乡土社会关系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村民可利用这一关系网络以实现生计转变。

如今，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探讨乡村生计变迁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 X 村案例所示，面对着由外部结构性因素引发的生计困境，村民从洗选产业“回归”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特色农业，自己解决了自己的“安置”问题。其中，“差序化代入”的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他们基于村庄“差序格局”的基本社会结构而做出的自主性应对策略，不同于国家投入力量进行转移安置。“差序化代入”机制可为解决相关从业人员的分流安置问题提供一些启示：首先，分流安置员工，在再就业过程中可激活社会关系网络，挖掘自然和社会资源，努力去自主解决生计方式转变难题；其次，政府的转移安置政策要从企业、社区基本的社会结构特征出发，以员工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适应性为前提，协调好政策引导性与员工自主性的关系，为员工自主再就业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中央电视台，<http://tv.cctv.com/2016/09/17/VIDEVP13kx7nLoj3z9EHD1tb160917.shtml>。

② 称谓缘由：当地村民习惯称呼村庄为“生产队”、组长为“队长”。

③ 数据来源于李队长的访谈，访谈时间：2016年12月。此外，本文统计的参与户数未达到人口统计数据的80%，李队长认为这是“一家多户”造成的。

④ 数据来源于益民乡统计站。数据显示：2016年，全乡蔬菜种植面积达14726亩、外销3.8万吨，水果种植面积2.3万亩、总产量8900多吨。

⑤ 情况说明：起初租赁李小勇土地的有新峰、博凡两家，后博凡被新峰收购。

参考文献：

[1] 王静，杜燕飞，闫璐，等.2016,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的“痛与断”[EB/OL].(2016-08-02)[2017-01-01].<http://energy.people.com.cn/n1/2016/0802/c71661-28602168.html>.

[2] 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7-22.

[3] 沈煜，丁守海.去产能会引起较大的失业风险吗？[J].上海经济研究,2016,(11):12-19.

[4] 刘社建.供给侧改革对就业与劳动关系的影响探讨[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6,(6):6-9.

[5] 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6]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6): 1360-1380.

[8] BIAN Y J.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 Network Bridges ,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7, (3):366-385.

[9] 钱芳，陈东有.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14,(1):56-59.

[10] 风笑天，赵延东.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其再就业机会获得的关系[J].理论月刊,1998,(8):24-28.

[11] 赵延东，风笑天.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2):138-146.

[12] 陈瑛，杨先明，周燕萍.社会资本及其本地化程度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中国西部沿边地区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2,(11):23-27.

[13] 刘正江.哈萨克族定居牧民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与社会适应——以新疆裕民县阿勒腾也木勒乡为例[J].中国穆斯林,2012,(3):25-27.

-
- [14] 周建新, 于玉慧. 橡胶种植与哈尼族生计转型探析——以西双版纳老坝荷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50-55.
- [15] 温士贤. 市场经济与怒族社会生计转型——以怒江峡谷秋那桶村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1):94-100.
- [16] 孙立平. “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 社会学研究, 1996, (5):22-32.
- [17] 陈俊杰, 陈震. “差序格局”再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 1998, (1):197-204.
- [18] 卜长莉. “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J]. 社会学研究, 2003, (1):21-29.
- [19] 张必春, 许宝君. 失独父母社会关系变迁的“差序格局”解读——基于社会身份视角的探讨[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67-74.
- [20] 阎云翔.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J]. 社会学研究, 2006, (4):201-213.
- [21] 孙国东. “特权文化”与差序格局的再生产——对差序格局的阐发兼与阎云翔商榷[J]. 社会科学战线, 2008, (11):254-257.
- [22] 周飞舟. 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J]. 社会, 2015, (1):26-48.
- [23] 翟学伟. 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 局限与理论遗产[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3):152-158.
- [24] 吴飞. 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J]. 开放时代, 2011, (1):112-122.
- [25] 杨善华, 侯红蕊. 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J]. 宁夏社会科学, 1999, (6):51-58.
- [26] 贺雪峰. 差序格局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J]. 江海学刊, 2007, (4):114-118.
- [27] 董磊明, 李蹊. 人情往来与新“差序格局”——基于河北顺平县东委村的考察[J]. 民俗研究, 2015, (3):118-126.
- [28] 苏力. 较真“差序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90-100.
- [29] 廉如鉴. “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J]. 开放时代, 2010, (7):46-57.
- [3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1.